

大學

大學章句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止於至善

朱熹集註

近代學研中國

Study on University in 1895-1949 Modern China

金以林 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近代
學代
研中
究國

Study on University in
1895-1949
Modern China

金以林 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金以林著—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2

ISBN 7-5073-0735-2

I. 近… II. 金… III. 高等学校—教育史—中国—1895~1949 IV.
G64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2669 号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西城区前毛家湾 1 号

邮编:100017 电话:63095931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850×1168mm 1/32 12 印张 275 千字

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 册 ISBN 7-5073-0735-2/K·334

定价:25.00 元

(版板所有,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 学术委员会评审意见

《近代中国大学研究》是著者多年的研究成果,较系统地考察了中国近代大学教育产生的社会背景、发展演变过程,并就一些问题作了较深入的探讨和分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资料丰富,文字流畅,是一部较扎实的学术著作。

该成果无著作权争议问题。

经所学术委员会开会评审,同意推荐申请
院出版资助。

学术委员会主任:张海鹏

E-27/69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一)

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孕育于中国社会急速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发展。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有着很强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促进高等教育改革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可惜,目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很不够,而且要进行这种研究确实存在诸多困难:首先,研究它不仅需要了解大学本身发展的脉络,还要熟悉近代中国历史的大背景;其次,有关这一课题的研究资料、档案文献十分分散,要想充分掌握它已非易事,再想在此基础上归纳理清它的脉络线索,并做深入研究,更是不易;第三,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的个体差异极大,又存在多种不同类型的大学,各自的发展规律不同;在各个不同时期,政府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政策以及各大学的微观变化都有所不同。大概因为这些原因,对该课题的研究一直难以取得重大突破。

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教育史研究成果(包括港台地区),大多将视角集中于教育界先贤的思想和传记方面,或者局限于论述教育宗旨、教育行政、教育方式的改

革和课程设置的演变等方面,或者简单地描述一些大学的沿革历史。总之,这类研究成果,多偏重于教育界本身,只是就教育谈教育,往往忽略高等教育同整个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关系。

金以林同志撰写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力图克服该课题研究中存在的以上局限,从一种新视角出发,努力勾划出近代大学同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关系,系统分析了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不同类型高校的演变轨迹。作者不仅对各大学做了深入扎实的个案研究,也能从宏观发展中,考察分析近代以来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各项政策,在近代社会和大学发展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基本反映出近代社会和大学教育的相互关系、大学自身的发展脉络,以及它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发展轨迹。作者还提出了不少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例如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配、师资利用率、政府对人才培养的宏观调控、如何利用外资办学并使它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等等。对这些问题,作者都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材料丰富、扎实,文字简洁、明晰。因此,我推荐院出版基金对该书予以补助,公开出版。

推荐人: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著作出版推荐意见书(二)

金以林同志撰写的《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一书,材料充实,脉络清晰,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研究著作,主要表现在:

第一,该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作者查阅了几乎全部近代以来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不同时期颁布的有关高等教育的各种公报、年鉴和统计数据等珍贵且不易查找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又参考了近代以来出版的各类报刊、教育家论著、校史、校刊、校友回忆录以及外文资料近二百种。因此该书所论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史料基础扎实、全面。

第二,该书有自成体系的独到见解。作者从历史学的视角出发,详细考察了近代大学教育和社会发展间的相互关系,揭示了不同类型大学(包括公立、私立、教会大学)本身的发展层次,对近代大学教育方方面面的内在联系进行了脉络清晰的系统阐述,使人读来一目了然。

第三,在近代大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有许多不易评价的问题,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具有相当客观与中肯的分

析能力。比如教会大学,作者既指明它创办之初带有明显的宣教作用,又顺着它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自我转型的演变,以及受中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法规的限制,逐渐从独立于中国主权之外的“文化租界”,变为替中国培养出不少人才,做出一定历史贡献的高校类型。这样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第四,作者文字流畅、朴实,很少空泛议论,而又不流于琐碎,对于一些重要且复杂的问题,作者从繁杂的史料中查找数据列成表格,简明清晰地勾勒出历史的概貌,也表现出作者具有相当的概括能力。

对于年轻人,肯埋头苦干,甘坐冷板凳,认真研究问题,并达到这样的学术水平,非常难能可贵。我愿意推荐这本书付梓出版。

推荐人:曾业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目 录

第一章	清末大学教育的萌发	
	(一八六二~一九一一)	(1)
一	近代大学教育的萌芽	(3)
二	近代中国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堂	(9)
三	从“百日维新”到“癸卯学制”	(18)
第二章	近代大学教育的兴起	
	(一九一二~一九二七)	(35)
一	民国初年大学学制的改革	(36)
二	公立大学的普及	(42)
三	私立大学的兴起	(66)
四	教会大学的发展	(97)
五	近代女子大学教育	(147)
第三章	南京政府统治时代的大学教育	
	(一九二七~一九三七)	(159)
一	大学院和大学区制的尝试与失败	(160)
二	限制滥设大学，整顿私立院校	(184)
三	整理院系结构，注重实用科学	(197)
四	努力提高教育效能	(207)

五	保障和增加教育经费·····	(214)
第四章	抗战时期大学的内迁、恢复和发展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225)
一	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	(226)
二	内迁·····	(232)
三	有关战时高等教育方针的一场争论·····	(250)
四	大学教育的恢复和发展·····	(256)
五	大学教育改革及其成果·····	(268)
六	沦陷区的大学教育·····	(289)
第五章	从复员到解放	
	(一九四五~一九四九)·····	(299)
一	战后的高校复员·····	(300)
二	从“反甄审”到“反内战”·····	(306)
三	迎接解放·····	(320)
第六章	结语·····	(325)
附录一	新中国建立前夕高等院校一览表·····	(335)
附录二	征引书目·····	(340)
附录三	索引·····	(356)
后 记	·····	(375)

第一章 清末大学教育的萌发 (一八六二~一九一一)



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出现，可以说是从外引进的，而不是从内部自然发生的；是被动而非主动的。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在同西方文化的接触中孕育出来的，然而这种文化接触，却是伴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来。

一八四〇年中英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中国战败，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辟五口通商。从此中国闭关自守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用炮舰打开，侵略者一个个接踵而来。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攻陷京津，火烧圆明园。直到此时，被李鸿章称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才真正震动了国人，清朝中央政府被迫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同列强交往。在同列强打交道的过程中，有一些高级官僚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被称为洋务派。洋务派的措施，史称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期间，他们创立同文馆，造就翻译人才，以便与列强交涉；创办水陆学堂，培养新型军事人才，以适应军队的近代化；又设立一些民用和军事工业，目的在于“富国强兵”。

三十多年后，甲午一役，清王朝又被东邻小国日本打得一败涂地。这一惨败，使洋务派的“富国强兵”计划完全破产。紧接着，列强纷纷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德国人租借胶州湾。俄国人租借旅大港，英国人租借威海卫，法国人租借广州湾，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仿佛已迫在眉睫了，这一切逼使着一些人满腔悲愤地喊出“救亡”的口号。

先进的中国人，从惨痛的事实中渐渐觉悟到，两千多年来老的一套再也不能维持下去了。他们那时相当普遍的看法是：要救亡图存，必须向外国学习，实行变法；要变法，首先要变人，这就必须从废科举、兴学堂做起。以前，中国几乎没有近代知识分子，只有旧式士大夫。他们熟读的只是四书五经之类

的所谓“圣贤之道”，擅长的也只是写一些“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章，用这些去应付科举考试，以求走上做官的道路。靠这样的士大夫，对于建设近代国家，抵抗外来侵略，都是根本谈不上的。这种状况不改变，中国是没有希望的。当时，梁启超的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他说：“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 戊戌维新运动要求改革政治，同时也开创了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新纪元。虽然短命的“百日维新”被旧势力打得落花流水，但是创办新式学堂却成为维新事业唯一保留下来的一项变革。

大学教育就这样由长期的孕育而呱呱堕地了。

一、近代大学教育的萌芽

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的萌芽，是从同西方国家接触后开始的。一八六〇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中有一批官僚，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出发，在“自强新政”的招牌下，鼓吹举办“洋务事业”，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洋务派”。

洋务派对西方文明的认识，仅局限于军事及有关的近代科学技术。在他们眼里，西方人的长处不过是武器精良和能够制造机械而已。因而洋务派在教育方面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新式学堂，兴办“西学”。而他们心目中的所谓“西学”概括起来讲，就是“西文”和“西艺”。“西文”即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西艺”即学习使用和修理洋船、洋炮、洋机器等技术知

^①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文集类编》上，光绪壬寅（一九〇二）年八月版，无出版地，页一一。

识。

在洋务派广泛设立的新式学堂中，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方言学堂，也就是外国语学堂，主要培养翻译人员；第二类是技术学堂，主要是训练能熟练驾驶轮船，使用和维修军工机器的人才和一些掌握现代化通讯技术的人员；第三类是军事学堂，主要是训练陆、海军指挥人才，培养能使用洋枪、洋炮的士兵和下级军官。

一八六〇年，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訢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对外交涉。但“欲悉各国情形，必先谙其言语文字，方不受人欺蒙”，而当时的清朝官员都不懂外语，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跟洋人打交道很困难。^①于是恭亲王奏请开设外国语学校。

一八六二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同文馆，它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最早的外国语学院。

同文馆培养的对象主要是八旗子弟，开始时只设英文一科，因为根据一八五八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订立的《天津条约》规定：以后中外交涉的条约均用英文书写，仅在三年内可以附用中文。后来同文馆逐渐增加了俄、日、法、德等国语文，但英语教学一直居于首位。一八六六年，同文馆又加设算学馆，学习科目逐渐扩大，包括算术、天文、化学、物理、万国公法、医学、生理等科，学习年限八年。这八年课程，前五年近似后来的中学程度，后三年近似大学专科程度。学生也陆续增加到一百二十名。同文馆的设立，是我国创办新式学堂的

^① 恭亲王等：《奏设京师同文馆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六一年十月版，页一一七。

开始，它后来并入京师大学堂，成为京师大学堂成立最早的一部分。

继同文馆而起的，有一八六三年在上海设立的广方言馆和一八六四年在广东设立的广州同文馆。这两所学校都是江苏巡抚李鸿章奏请创办的。它和同文馆不同点主要是，同文馆的学生均是八旗子弟，而广方言馆打破了这种限制，广泛接纳汉族子弟入校学习。李鸿章在奏折中明确表示：“夫通商纲领，固在总理衙门；而中外交涉事件则两口（指上海、广州）较多，势不能以八旗学生兼顾。唯多途以取之，随地以求之。”^①

这三所学校都可归属于外国语专科学校一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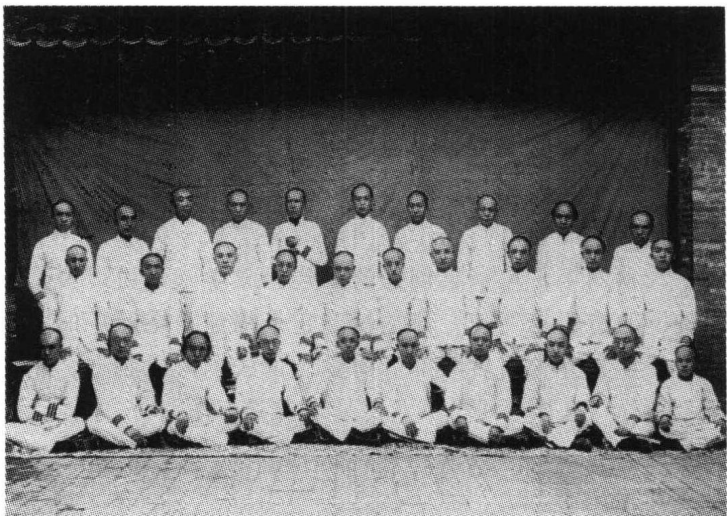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造船与驾驶专科学校。它是福建马尾船厂的附设学堂。这个学堂分为前后两部。前堂聘请法国人教制造，用法语授课，又称“法国学堂”，主要是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后堂聘请英国人教驾驶，用英文授课，又称“英国学堂”，主要是培养驾驶人才。

一八六七年，曾国藩采纳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的建议，创建了上海江南制造局，同时在该局附设机器学堂和翻译馆。翻译馆专门翻译西方有关理化工程方面的书籍，它对于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相当深远的影响。机器学堂是一所工程学堂，科目繁多，不同于船政学堂仅设造船与驾驶两科。又过了几年，李鸿章在同洋人打交道中，深感“用兵之道，必以

^① 李鸿章：《请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折》，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上册，页一二九。

神速为贵”，“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①为此，他于一八七九年设立天津电报学堂。三年后，又在上海建立了一所电报学堂。

以上这四所学校，都可以归属于工业专科学校一类。



身穿制服的北洋水师学堂学生

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军事专科学校。它是李鸿章于一八八〇年创办的。该校分驾驶与管轮两科，都用英文讲授。它虽与福建船政学堂有相似之处，但偏重于军事方面。继这所学堂而后创立的有广东水师学堂（一八八七年）和南京水师学堂（一八九〇年）。至于陆军方面，则以一八八五

^① 李鸿章：《请设南北电报片》，高时良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洋务运动时期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页五四一。

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为最早。该学堂分两部：一部是轮流挑选各营弁兵百余人学习使用西洋武器，这是士兵教育的开始；另一部选募有一定知识的“良家子弟”，培养军事指挥人材，这是中国近代军官教育的开始。这所学校培养的学生，成为后来“北洋军系”的胚胎，著名的“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均毕业于该校。继这所学堂之后创立的有：广东陆军学堂（一八八六年）、南京陆军学堂（一八九五年）和湖北武备学堂（一八九五年）。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八九三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军医学堂，这是中国人自设西医学校的开始。

以上这几所学堂都可归属于军事专科学校。

洋务派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三十多年兴办的洋务教育，对中国传统封建教育可以说是个突破和重大改革。洋务教育在教学内容方面，除了教授传统的学科之外，还扩充了一些近代科学技术和外国语文。在教学方法上也有不少改进，客观上对传播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专科学校、创建我国近代的大学教育，都起到了一定的奠基作用，对以后的维新运动也产生过积极影响。

然而在一八九四年爆发的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海、陆军遭到惨败，洋务派经营了十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实际上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甲午战后，中国面临着被瓜分的危机。于是在士大夫中间兴起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维新变法运动。

这一运动在教育领域中引发了一场“中学”与“西学”之争。洋务教育的主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以传授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主，以学习西方实用科学为辅。这一理论